

書林掇英

——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

魏隱儒 著 李雄飛 整理校訂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魏隱儒 著 李雄飛 整理校訂

書林掇英

—— 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魏隐儒著,李雄飞整理校订.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3

ISBN 978 - 7 - 5013 - 3574 - 9

I. 书… II. 魏… III. 古籍—图书目录—中国 IV. Z8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73188 号

书名 书林掇英——魏隐儒古籍版本知见录

著者 魏隐儒著 李雄飞整理校订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 50.125

字数 84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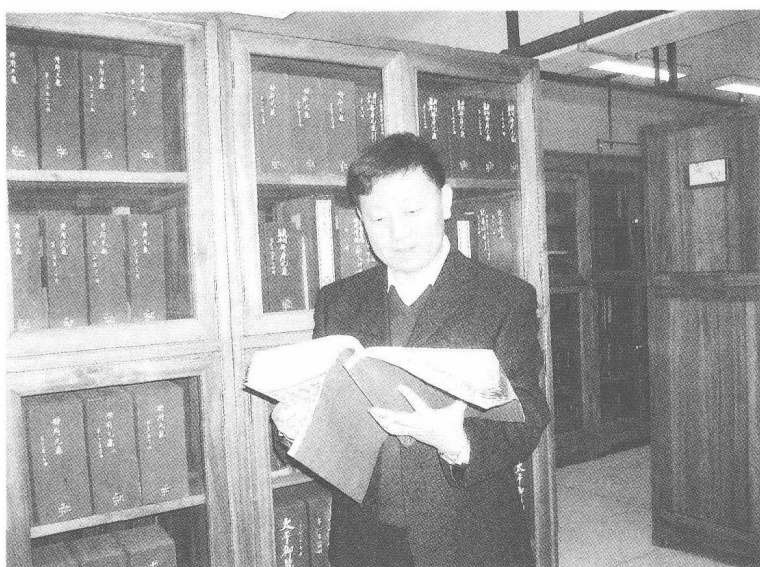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574 - 9

定价 190 元



魏隐儒(1916 - 1993),河北束鹿人。著名古籍版本学家、当代书画家。自幼喜爱书画,1935 年考入私立北平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一代写意画宗师李苦禅先生,为苦禅大师的入室弟子。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和山东的中、小学任教职。建国后,调入图书发行系统工作,先后供职于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新华书店、中国书店。接触大量古旧书刊,参与定价,同时担任《古旧书刊介绍》编辑,由此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古籍事业。后调入北京市文物局,从事书画、文物、古籍的鉴定整理工作。1978 年,国家成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开始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被聘为编委和集部副主编,并在高校及专业培训课上讲授古籍雕版发展史、古籍版本鉴定等课程。同时受全国多家图书馆之邀,检查并协助鉴定古籍版本。长期从事古籍版本的研究、教学和鉴定工作,先后撰写出版了《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史话》、《藏书家考略》、《古籍装订修补知识》等学术著作。此次出版的《书林掇英》,是其总结半生古籍版本研究历程之遗稿,是最能代表魏隐儒先生版本研究水平的心血之作。



李雄飞,山东招远人,出生于河北唐山。毕业于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图书馆学专业本科,文学学士。后又先后毕业于北京满文书院第四届研究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班。自1990年起,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从事古籍编目工作至今,副研究馆员。先后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及杂文60余篇,参与编辑整理古籍图书22种,百余册,并有多篇(种)获得各种奖项。现为北京市满学会会员、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古籍版本和满文古籍等方面的研究。

序

黄裳

过去买旧书的人,开手时总得先备一、两种目录书作参考,如《邵亭书目》和《四库目录标注》之类。等到收书渐多,觉得这种入门的参考书不够用了,不能不添购若干公、私藏家的目录,不过还是很难遇见可以满足版本鉴别需要的参考书。黄丕烈曾刻过一部《季沧苇藏书目》,在跋文里说的一番话大抵可以说明藏书家的心事:

余喜蓄书,于目录尤所留意。晁、陈两家之外,近惟《读书敏求记》叙述原委最为详悉。然第讲论著书之姓氏与夫得书之颠末,若为抄为刻,未必尽载。故偶遇述古旧藏,取记中所载者证之,一时无从得其面目。

他的最后结论说,

方信藏书不可无目,且书目不可不详载何代之刻,何时之抄,俾后人有所徵信也。

这是黄尧圃对书目所悬的标准,已是近两百年前的事了。这以后出现的公、私藏书目录,在著录版刻上也并无明显的进步。即以最近才得完工陆续刊行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论,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与黄丕烈当年所悬的标准相较也并无长足的进步。连行款也不记,只光秃秃地标明“明刻本”、“清刻本”、“旧抄本”……。悬揣大约采取的是慎重态度,惟恐断代或有失误,会贻人口实。其实以今日的鉴定水平,这问题是大体可以解决的,即便偶有失误,也会取得读者的谅解。过份谨慎的结果只能是裹足不前。在这本书目中,常常遇到同一书著录了数种至数十种本子,但并不反映这些异本之间的异同,及其何以被定为善本的根据。有些著名的国藏善本,为读者耳熟能详的,在这本书目中也往往畿费猜详,终于不敢确认。花费了如许人力物力,那么长的时间,而所得仅此,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的。如果想从黄丕烈二百年前所提出的希望前进一步,就不能不要求在著录善本时,起码要审定并著明版刻时代、行格版式、刊工姓名、刻书牌记、藏书印记、有无题跋、纸质如何、印本先后。抄本也不能只以“明抄”、“旧抄”了之。写手的精粗,时代的先后,都并非绝不可知的。当然这样做要花更多的力气,冒不少的风险。但衡量一种著作的学术水平,也只能求之于此。相

信这并不是放言高论,其实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近代几部著名的私家藏书志,大都由藏书家聘请著名的学者修定。叶昌炽、缪荃荪、王国维、张元济都是其中的健者。但作者都不署名,只由藏家出面。据以入录的也只限于一家的私藏。他们都不能突破前人的窠臼,进展不大,走的还是《读书敏求记》的旧路。赵万里先后编成北京图书馆和李木斋的藏目,后来又写成《中国版刻图录》,有一卷说明,功力甚钊。能照顾到雕版的不同方面,特别标出刊刻地区,这是前人所未曾注意的,虽然其中不无失误,但作为新领域的开拓,是值得重视的。其所以能获得如此成就,主要自然是因为环境条件好,见书多,鉴别力高,又勤于积累。这些都是以一家一馆所藏为基础而进行的研究。此外,还有一群出没于更深广的书海中的贩书人,他们的经验之受到重视恐怕要以江建霞为最早。江标刻出了徐康(子晋)的《前尘梦影录》,这是一位古董书籍经营者的回忆录,书籍只占全书的一小部分,但即此也已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江标在序文中说,他是在苏州元妙观世经堂书肆中得见徐子晋的,“书肆为湖州侯念椿所设。侯年亦六七十,目睹各家藏书兴废,分别宋元槧刻,校抄源流,为辨毫厘。尝称之曰今之钱听默。曾属其将数十年来藏书见闻,杂写一册,亦吾乡掌故也。”这真是一个好主意,可惜很少有人响应,多少年来几乎难得看到什么成果。只有孙殿起的《贩书偶记》,王晋卿的《文禄堂访书记》聊资点缀。琉璃厂海王村的书肆群有几百年的历史,经营书业的人物也才俊倍出,其中有心人如孙王者必然不只一二。果然,在我得见魏隐儒先生《书林掇英》的部分手稿后,才发现悬想不虚。他在版本著录上所下的功夫在在都有突过前人之处。举凡书名、卷数、作者、断代、行格、版式、封面、刻工、题跋、藏印、纸张诸项无不一一著录,使一书的全貌粲若列眉,对藏书家和版本研究者都是绝好的参考资料。所著诸书,都为作者目见,绝无转相援引、不尽不实之病。当然,这并非全面性的记录,流转于东南一隅的典籍就不为作者目光所及,但建国前后迄于今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旧书流转踪迹,大致是得到了反映的。上可与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相衔接,旁参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百年来我国善本书的流转聚散,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了。

作者特别注意戏曲、小说的著录,成为此书的一大特色。以明刻不同版本的《西厢记》而论,此书所收即有五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厢记》的学人从来未能全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参加了一九七九年故宫博物院康生存书的整理工作,从中发现了这个“藏书家”在十年动乱中掠夺善本图书的不少赃证。傅惜华、阿英、刘盼遂诸家的藏书都曾为康生掠去,加盖了“康生”、“戊戌人”、“归公”、“康生看过”、“大公无私”等印章,还记下了康生属名张三洗在万历梨花馆刻《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上的“题词”,使人们得以领略这位“西厢研究专家”的“高见”。在被康生掠去的刘盼遂旧藏嘉靖本《东坡后集》条下还附注了刘氏生平与文革中受迫害死去的小传。既是藏书史话,也是文革痛史,使人有读新的《钤山堂书画记》之感,不能不说是意外的收获。

作者还随手记下了访书经过,收售书价,版本差异,鉴别依据等,这些细琐的记录也都是饶有趣味,也有史料价值的。可惜没有记下收售的时日,不然据此是可以写定一册书价变迁史的。宋刻孤本《楚辞集注》,是由访书人当作高丽本以二十元收进的。后来发现是宋刻孤

本,又向原主补还三百元。最后售归北京图书馆,价二千元。如与今天琉璃厂的书价作比,不能不使人怀疑其为天方夜谈式的传奇神话了。

《书林掇英》的另一部类为现代史料,详尽地著录了一九一九至抗战时期革命进步书报。这是一项未经前人涉足的领域,其文献价值绝不下于古刻旧抄的辑录。报刊杂志成为旧书行的专业之一,还是近数十年兴起的风尚,松筠阁的刘殿文先生就有“杂志大王”之称,可见留心此事的并不乏人。这与近数十年来书林风气的转变是颇有关系的。经部的被冷落,史部集部的走红,尤其是地方志身价的飞涨,无不显示读书风气的日渐趋于实际,文献史料受到格外的重视。进步书刊的收集著录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余波,是一种健康的走向。(作者手稿中的“革命书刊”部分,此次未予收录于本书中——编者注)

五十年来在书坊中走动,先后也遇见过不少经验丰富,阅历深广的书友,如南方的郭石麒、杨寿祺,北方的孙实君、孙助廉等,都是装着满肚子书林掌故的人物,也曾多次劝他们就知见的善本书与藏家流散故实做些纪录,迄无结果。他们都已先后去世,我的劝说也成为虚愿。现在得读魏隐儒先生四十万言的巨编,不能不有空谷足音之感。欣喜之余,辄抒所见,是为序。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序

杨殿珣

我和魏隐儒同志相识,是在三十年代——“七七事变”之后,当时他任北平市市立北下关小学校长,并在北平美术学院国画系攻读,他在书画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深为当时在北平美术学院执教的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所器重,得为李苦禅先生的入室弟子,在平、津等地,多次举行书画展览。隐儒除潜心钻研绘事外,还广读历代有关书画典籍,从事书画理论之研讨,由于广搜博览,因而在图书版本方面,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隐儒在北京中华书局工作。解放后,由中华书局转入中国图书公司、新华书店,1956年北京古旧书店公私合营时,他从事北京古旧书业的改造工作,从而接触了大量古旧书刊;来到中国书店后,他担任编写《古旧书刊介绍》,向学术界推荐从各地蒐访来的古旧书刊中的善本;同时还参加古旧书籍的议价业务,这触发了他早年研究图书版本的兴趣,因而他立志,要对图书版本作深入的研究。他忘寝废食,夜以继日的工作,检查公私藏书目录,走访公共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访问藏书家和书店采购工作者,有所得辄濡笔记之,写成笔记,集有数十册之多。

他将记录所得,陆续编写成《中国古籍印刷史》、《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史话》、《古籍鉴赏》、《藏书家传略》、《书林掇英》等。前三种已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印行。其中《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一书由日本横滨大学波多野太郎教授译成日文,在东京东方书店出版。

《书林掇英》主要是隐儒同志在大量古旧书刊中,选取稀见罕传而又有价值部分的记录。但所记不仅限于在中国书店所见,还包括1961年来薰阁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的展品;1964年中国书店举办的善本书籍展览的展品;1974年辽刻书籍展览的展品;1978年在太原讲“中国古籍印刷史”时所见到的善本;1979年到东北各地审定善本书时所见到的善本;参加古籍善本书目座谈会时所见到的善本;在故宫博物院整理书籍时所见到的善本;1984年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讲课时所见到的善本;以及历年在中国古籍善本编委会工作时,受各地委托审定的善本等。

《书林掇英》中所记录的古籍善本,除明、清刻本之外,有宋刻本一百四十种,辽刻本五种,金刻本四种,元刻本一百一十种,明恒版印本一种,明拓印本一种,清磁版印本二种,清铃印本一种,太平天国刻本一种,高丽刻本四种,日本刻本二种。在活字本中有明木活字、铜活

字本、清木活字、铜活字本、泥活字本以及高丽活字本、高丽瓢活字本、日本活字本。在写本、钞本中有唐写叶子本、唐写卷子本、宋写本、宋写绘本、辽写本、元钞本、明钞本、明绘本、影宋钞、影元钞本、清彩绘本、清钞本以及高丽钞本和日本钞本。刻本、写本、活字本之外,还有稿本八十九种,真可谓琳琅满目了。除了古籍善本之外,还记录了自清代末叶起到建国前为止有关现代史的罕见文献资料二千余种。隐儒见到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古籍善本和现代文献,可谓眼福不浅了,这都一一记录在《书林掇英》里,可以说是《书林掇英》的第一个特点吧?

在本书中,对于版本鉴定方面,记载颇多,这是隐儒的兴趣所在和工作需要的原故吧?如关于活字本的鉴定,隐儒总结出他的鉴定经验,指出活字本的特征,是在版心鱼尾上,因为他总是离开左右行线的,举出清雍正三年汪善彩南陔草堂活字排印本《眉山诗集》(宋唐庚撰)和嘉善陈唐用活字排印的《后山居士诗集》(宋陈师道撰)两书为例,两书字体写刻,排印极精,几与雕版无异,所以有些图书馆定为刻本,但经精细审定,鱼尾是离开了左右行线的,显然是摆印而非刻本。还有有的刻本又极似活字本,如明刻本《水东日记》(明叶盛撰),此本字体大小不一,栏线接头处多离开,定为活字本,似无问题。但隐儒持与其他藏本相较,发现卷十第四叶、卷十四第三叶、卷二十一第五叶、卷三十第五叶和第十叶、卷三十三第十叶、卷三十七第四叶,有版断裂多处,既然版有断裂,当是刻本而非活字本。

在1961年,隆福寺文殿阁主人王平斋家散出《周易说略》(清张尔岐撰)一书,系康熙五十八年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版印本,封面上题有“泰山磁版”四字。磁版印书,为前人所未论及,是磁版呢?还是磁活字呢?此书字体、栏线有些歪斜不整,给人一种活字本的感觉,因而有人著论,定为磁活字。隐儒对旁人的议论,一向是尊重的,但不人云亦云,总要找到证据,心才帖服。何以徐志定在序文中只提到“偶创磁刊,致胜木”,并未谈到磁活字、摆印等字样呢?因而他对《周易说略》一书,反复考究,发现书中文字有断板裂版的地方,有十一处之多,而且版框高低不一。一般说来,活字印本栏线不整,字形歪斜,偶有倒字,是比较常见现象,而断版裂版,则是板刻中的情况,且版框高低不一,也是活字本所不应有的现象。后来又见到徐志定另一种磁版印本《蒿庵闲话》,其字体、版式与《周易说略》相同,也有断版两处,行隔间有界线,弯曲不直。从两书的情况看,隐儒肯定是“磁版”,而不是“磁活字”。

隐儒在鉴定版本上,常常举其中一字以定之。如明隆庆辛未豫章夫容馆刻《楚辞章句》,初印本卷二第十三叶彗星的“彗”字,原刻为“慧”,后印本乃改正为“彗”,据此“彗”字,可以区分初印和后印。《全唐诗》有清康熙间内府刻本和仿刻本,内府刻本第一册目录总目内杨重玄的玄字,玄字缺末笔,仿刻本则改玄作元,据此“玄”字,可以区分内府刻本与仿刻本之异同。《红楼梦》有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萃文书屋活字排印本,称为程甲本,又有乾隆五十七年程伟元活字排印本,称为程乙本,甲、乙两本传世都不多,而甲本尤少,人多重之。甲、乙本的区别,最确切也最容易检查的办法,是第一回的回字,程甲本作“回”,程乙本作“同”,据此“回”字,可以分别出程甲本与程乙本。这些以一字来定版本之异同,真是一字重千钧了。

在鉴定版本上,常常遇到的麻烦是旧日有的书商,为了谋求高利,在书上作手脚,或以残缺全,或以提前刻书年代,如明宣德甲寅年尊德书院刻的《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十卷,书商将牌记中宣德的“宣”字,挖去下段,只留“宀”,描为“大”字,一字之挖补,即由明宣

德升为元大德了,并在挖改处盖有小印章以掩饰其作伪,孰料这正是作伪者心劳日拙之处,令人怀疑的正是在这里何以盖有小印章呢?将挖补处在阳光下照之,便原形毕露了。又如明正统八年刻本《汉书》,版心刻有“正统八年刊”字样,但作伪者将天头地脚裁去接补,配纸与原书无异,上下栏线描绘,将版心“正统八年刊”,挖改为“乾道三年刊”,挖改描绘,技术极精,所以在当时辨识的鉴定者,也各抒己见,见解各异。最后,隐儒持与正统《汉书》相核对,才发现作伪的证据,肯定为明正统翻刻宋本,作伪者虽然挖空心思,终未能逃出鉴定者的慧眼。

上述这些版本鉴定的例子,书商作伪的例子,对于古籍整理者和图书馆工作者,是极应了解,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的。《书林掇英》积累了很多的资料,是非常宝贵的,这可以说是《书林掇英》的第二个特点吧?

记录书中的题识、藏章,可以说明这部书的过去流传情况,在《书林掇英》中,用了不少篇幅,作了较为详尽的记录。隐儒所记录的还不止于此,他更注意到某书的访得者,因为古旧书籍的来源,多是由于自己采访所得,才得流通,这就是走访各书店采购工作者的缘故吧?《书林掇英》所记录的书籍采访人有二希堂的王希华、三友堂的于铭、大雅堂的李拔元、文奎堂的刘满进、文殿阁的王平斋、文渊阁的李殿臣、萧文豹、文汇阁的傅宗泰、开通书店的郭纪森、中国书店的白廷智、吴希贤、魏广洲、东来阁的李佩亭、东雅堂的徐元勋、来薰阁的陈济川、宝古斋的樊玉珊、宝铭堂的李叔谦、育民书店的洛云培、丽生书店的魏丽生、信义书店的韩信义、效贤阁的裴效先、修绠堂的孙助廉、张金阜、新民书店的张寿鹏、群玉山房的张士达、蜚英阁的裴子英、鸿文阁的王文礼、葛鸿年、邃雅斋的董惠卿、藻玉堂的王子霖以及撰述《文禄堂访书记》的王晋卿、撰述《贩书偶记》和《清代禁书知见录》的孙耀卿等。他们都是毕生从事于古旧书业的工作者,终日奔波于各省市及农村,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将所访获,转售于公私图书馆、科研单位及科研工作者,许多古籍得以保存并发挥应有作用,他们在古籍流通上对于文化界的贡献,可谓功莫大焉,这也许是隐儒特意记载的微意吧?

在《书林掇英》里,常常看到“书传世极罕”、“此书不见各家书目著录”、“此书单行本甚罕见”等等的记载,对于传世极罕的原因,也有所记载。如明黄淮、杨士奇等编的《历代名臣奏议》,当时书成,刊行仅数百本,版藏禁中,世颇稀有。明严从简辑《殊域周咨录》,见于《清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为清代禁书,传世极罕。清杨光先撰《不得已》,记述杨光先控告西洋人将来必为大祸事,当时西人极恨之,因以重价购得焚毁,故传世极少。清阎镇珩辑《六经通典》光绪癸卯刻本,此书初印后,版即焚毁,故传世极罕。以上所举,乃仅就明、清刻本而言,至于宋、元时代刻本,由于时代较远,屡经天灾人祸,以及保存不善等等原因,流传至今的,当是幸存者了。

隐儒特别关心古籍流传问题,大约是唤醒大家,要特别加以爱护,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不憚其烦而一再的言之。注重记录有关古籍流传问题,这可以说是《书林掇英》的第三个特点吧?

隐儒不只对古籍加以翔实记录,对于现代文献资料,一如记载古籍善本,非常严肃认真。除著录其书名、编著者、出版者,并著录其印刷形式、所用纸张、大小开本、序跋概要及内容篇

目。其中以革命小册子为最多,革命小册子,有人称为“新”善本,用以区别传统上所称的善本,不只流传甚少,而传播革命上,树立过丰功伟绩,称为善本,谁曰不宜?

在反动统治年代,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为了逃避敌人的眼目,有的书名、著者、出版者、内容题目都作了伪装,如题周作人著的《秉烛后谈》(《艺文丛谈》六),内容是解放区各种政策文件汇编,题作《南堂诗草》,是解放区关于工商业的政策;题作俞理初的《谈谐》,是《解放区工商业政策》;题作《谈宴会》,是《陕甘宁边区保护工商业布告》;题作《谈关公》,是《知识分子问题》;还有《谈卓文君》、《闲谈桑梓》等,都是党在当时的政策指示文件。有的还在封后印有“看完后请将此书借给你的亲友”,以广宣传。

期刊的伪装也是如此。如《红旗周报》第二十四期,封面印为《时代周报》第二卷第四十五期,内容为《纪念广州公社——共产国际六次大会告中国工农群众书》和《蓬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布尔塞维克》第二卷第七期,1927年7月1日“工人教育研究社”出版,伪装封面印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时代国语教授书》第七册,内容为李立三、项英、恽代英等十位同志写的文章;《党的生活》第七期,1930年4月15日出版,伪装为《灵学研究》,第八期伪装为《文学研究》,第九期伪装为《卫生丛书》第十种,日本松田著。内容都是有关党组织工作的论著。

这些革命书刊,在反动统治者严密查禁封锁的情况下,能够流传保存到现在,真是凤毛麟角,确是《书林掇英》中之“英”;隐儒汇而记之,这是他的特识,他的创举,也可以说是《书林掇英》的第四个特点吧?(作者手稿中的“革命书刊”部分,此次未予收录于本书中。——编者注)

《书林掇英》的特点,当然不只这几点,姑且举此四点,用以示例罢了。

由于是随得随记,分别记在几十册笔记本里,友们希望他整理出来。他也久有此意,但他忙于社会活动,不得不利用空隙时间,争分夺秒。黎明即起,而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从不请人帮助。经年累月,才得录成初稿,惟尚需时日,要作进一步整理。诂料隐儒于今年五月下旬自川返京后,偶感身体不适,由于身体素称康健,不以为意。经医生检查,即被留住院,竟于六月二日上午八时,由于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矣!享年七十八岁,呜呼痛哉!

忆余与隐儒相交,已五十余载,平时时相过从。近来由于他社会活动频繁,相晤较少。但总是忙里偷闲,相机晤谈,谈心得,谈观感,甚至生活琐事,无一不谈,真是如鲠在喉,吐后方快。而今拜读他的遗稿,睹物思人,曷胜山阳闻笛之恸!写至此,恍忽隐儒犹在目前侃侃而谈,真不禁令人老泪滂沱了!

1993年9月3日记

丹青凝风骨,绝学傲书林

——序《书林掇英》

姚伯岳

魏隐儒老先生的《书林掇英》一书要出版了。该书的整理者李雄飞是我的同事,知道魏隐儒是我的老师,便想让我给这本书写个序,于是引起我思潮涌动,昔日和魏老相处的情景蓦地浮现在眼前。

记得那是1985年的秋季,我正在上研究生的第二年,现在叫研二。一开学,我的导师郑如斯老师就宣布要请一位精通古籍版本的老先生给我们上一学期的“版本学”课程,老先生的名字叫魏隐儒。开讲那天,郑老师陪着一位老者走进来,老人身体瘦高,面貌清癯,气质儒雅,稍带一点严肃。我们几个学生不知老先生底细,毕恭毕敬听讲。但仅仅一堂课下来,我们就开始喜欢上了这位以前似乎不知名的版本学专家。

在一学期的授课过程中,我逐渐对魏老的身世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魏老1916年阴历八月初六日出生于河北省束鹿县泗上村,自幼酷爱书画,每临帖不懈。书临颜真卿《麻姑仙坛记》、柳公权《玄秘塔》、欧阳询《醴泉铭》、李邕《岳麓寺碑》;画以《芥子园画传》为范本,每有所作,皆深受乡贤前辈赞赏。1934年到北平第十四小学任事务员,同年转到红山头小学任教员。授课之余研究书画,书法改学汉魏六朝碑刻,对《石门颂》、《张迁碑》、《孔宙碑》、《张猛龙碑》、《龙藏寺》、《龙门二十品》等用力尤勤。1935年创办西直门外北小关小学,任首任校长。同年考入私立北平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执教于该校的李苦禅先生,为其入室弟子,经常到西单柳树井2号苦禅先生家里学画,天晚就留住李家。1939年5月,苦禅先生因资助青年学生到抗日根据地,在家中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当晚留宿李家的魏老也被用同一副镣铐带走,师生在沙滩原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刑讯室备受各种酷刑,最后被营救出狱。

共经患难之后,苦禅先生对魏老更为器重,故魏老得其真传,艺事大进。曾多次与苦禅先生在北平、天津、济南、青岛举行联合画展和个人画展。魏老的书画,用笔苍劲,运墨浑厚,章法布局,气势磅礴,其作品以苍鹰、鹭鸶、雏鸡、紫藤、白梅、红菊、竹雀、荷花、牡丹等最受好评。魏老曾赠我一幅牡丹图,我后来出示给一些行家鉴赏,均给予好评,谓有大家气象。据我所知,在其去世前,魏老尺幅画作的均价已达到人民币1万元。

魏老出狱后,先任北京西郊大有庄小学校长,后又辗转任山东德县中学教员、德县女子

中学教导主任,1944年转任山东巨野中学教务主任。1946年任中华书局分局交际主任兼北平私立嵩云中学教员。建国后转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新华书店、中国书店工作,1956年被分派在中国书店划价组从事古旧书刊的定价业务,同时编辑《古旧书刊介绍》,从而开始了对古籍版本的研究工作。在此后20多年的古籍工作生涯中,魏老接触了大量古籍图书,积累了丰富大量的古籍版本经验,并对所经眼的珍善本古籍做了几百万字的资料记录。

“文革”过后,魏老调入北京市文物局,在文革文物落实组从事古籍文物鉴定整理工作。1978年国家成立中国古籍善本书编辑委员会,开始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魏老被聘为编辑委员和副主编,并为在山西、北京等地举办的古籍善本编目骨干培训班讲授古籍雕版发展史、古籍版本鉴定等课程,之后又到北京、东北三省各公共图书馆、大专院校图书馆、机关单位图书馆检查并协助鉴定古籍版本。于是,魏老在古籍界声誉日隆,反倒超过了他在书画界的名气。有一次我陪魏老到北京图书馆参观一个展览,北图的李致忠先生出来迎接,我亲眼看到他对魏老的敬重和推崇。

我认识魏老的时候,正值他近三十年的古籍生涯结出硕果之际。1984年4月、5月,魏老先后撰写出版了《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国古籍印刷史》,这是他在古籍版本学研究方面的两部代表性著作,也是我上他的“版本学”课程的教材。稍后的1988年,他又撰写出版了《印刷史话》一书。我收藏的这几本书上都有他给我的签名。我曾为他的《中国古印刷史》一书写过一篇书评,篇名是《卅载耕耘喜逢秋》,刊登在《印刷技术》1986年第6期上。魏老很喜欢这个篇名,对此感慨良深。

魏老的古籍版本学,有其独特的风格。

魏老当初在中国书店的工作,是为古籍定价。每天经手古籍数量非常大,不可能对每部书都进行严密细致的考证研究,加之旧书店同仁的风气传承,所以养就了一种“观风望气”的本事。他对于古籍的外观形态特别留意,对于古书的用纸、用墨,甚至是藏印的印色区别,都了然于胸,讲得头头是道。

魏老精通书画,所以对古籍中的雕版插图特别感兴趣,对不同时代古籍版画的风格特色有很专业的评说。

同样原因,对于古籍中那些书法优美、雕印精细的版本,魏老是从书家角度进行欣赏。他特别喜欢清代的写刻本,对“林佶四写”、秀野草堂刻本赞不绝口,对于书法极佳的清雍正十一年(1733)广陵般若庵刻本《冬心先生集》、乾隆十四年(1749)郑燮手书上版的《板桥集》、乾隆六年(1741)吴江沈守义所刻《南船记》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是清刻本中的绝作。

魏老不受明清以来佞宋崇元风气的影响,善于从古籍版本的实际出发评价版本。对于民国以后的雕版印书也能予以相当的关注,对民国间雕版印刷的几位大家张钧衡、蒋汝藻、刘承幹、徐乃昌、刘世珩、吴昌绶、董康、陶湘等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对于古代的活字本,尤其是泥活字,魏老倾注了很多心力,论证了泥活字的可行性和多样性。对于泰山磁版的特点,魏老是论述最多的一个。

魏老授课时,每次都随身带着一个大纸盒子,里面装满了他历年来搜集的古籍残叶。讲到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用纸、用墨和刻本字体、版式面貌,随时出示相应的书影残叶,这样

的教学,生动直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在版本学专业入门很快,与魏老这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魏老还特别重视对古籍版本相关知识的学习和介绍。他时不时讲到的一些古籍知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让我们特别注意正确理解古籍中各种名词术语的含义,比如:“龙飞”、“鼎镌”、“壮月”这些有时出现在古籍书前书后部位的名词表示什么意思,让我们知晓了古代纪年纪月的各种不同方法。

他让我们注意古籍版心中记录一块书版上所刻字数的表示方法,并进而教给我们如何识别这些算筹数字。

他不时讲到有关文字的各种知识,像“梅”字的常见异体“𣎵”、“𣎵”等,哪些字虽然偏旁位置不同但其实是同一个字,怎样识别牌记、印章中的篆体字,等等。

魏老还经常告诉我们一些鉴定古籍版本的“小窍门”,比如鉴别刻本和活字本,只需看书口版框上方,就可以一目了然:上方参差不齐的是刻本,上方整齐的就是活字本。

魏老讲“版本学”,风趣自然,内容丰富,又能够系统而有条理,一个学期的课程,让我学到了太多的东西。稍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请魏老作答辩委员。魏老的版本学思想方法深刻地感染了我,对我后来的教学、工作和研究有重要的影响。

1986年底,我毕业留任任教,讲授《图书馆古籍编目》和《版本学》课程,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魏老的衣钵,所以和魏老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我曾多次去过魏老在安定门外兴化西里1号楼3单元102号的家里,我清晰地记得,进门的左手是他的画室,魏老每次接待我,都是在他的这间画室里。他的这间狭长的画室,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在这间画室里,魏老曾赠他的画作给我。

在这间画室里,魏老为我校点整理的宋代程俱的《麟台故事》一书题写了书名。

在这间画室里,魏老曾让我观赏一卷敦煌卷子,边看边给我讲敦煌卷子的特点。

在这间画室里,魏老曾教我给卷轴系绳应该系在什么位置才紧实牢靠。

在这间画室里,他听说我要开设《版本学》课程,便拿出他当初给我们上课时所用的那一大盒古籍残叶,说我上课时可以随时使用。

我还记得,紧贴大画案靠窗的地方是他的办公桌,上面靠墙处总是摆放着一摞厚厚的稿纸。有一次,魏老告诉我那是他正在编写整理的一部古籍善本书提要书稿,他给这部书起的书名叫《书林掇英》,快要定稿了。他说他还在编写一部关于中国古代私人藏书家传记的书,但是很难写,等写完《书林掇英》,他再接着完成这部藏书家传略。当时他很恳切地要求我给他的《书林掇英》写序,让我大吃一惊。我说,我是您的学生,晚生后辈岂敢给老师的书作序!魏老见我态度坚决,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

我最后一次去魏老家,是在他去世前的半个月,大概是1993年5月中旬,魏老身穿整齐的中山装,告诉我他即将要到四川去参加一个笔会。当时,老人稍显出一些疲倦,我还劝他注意身体。谁知老人就是参加这次笔会回来后,即于6月2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77岁。我当时在外地函授辅导,回来后闻听噩耗,真如五雷轰顶,悲痛万分。但因为葬礼已过,我没

有上门吊唁。也就在这一年,我的《版本学》一书出版,我在书前《自序》最后写道: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惊悉著名古籍版本学家、书画家魏隐儒先生猝然辞世。魏老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为我面授“版本学”课程,此后一直关心着我在事业上的成长与本书的写作出版情况,给我以莫大的教益。今以此书献给这位可敬的版本学界老前辈,以表达我作为弟子的深切缅怀之情。

10多年过去了,我发现,各界人士并没有忘记魏老,他的画作已得到书画界的普遍肯定和广大收藏者的重视与喜爱;他在古籍版本学和中国书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也被学术界所公认。1997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又出版了魏老的《古籍版本鉴赏》一书。现在,最能体现其版本学成就的《书林掇英》一书也即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我最终还是为这本书作了序,这也许就是我和魏老的一种缘分吧。回想及此,令人不胜唏嘘。

姚伯岳

2009年3月15日

整理说明

《书林掇英》是已故著名古籍版本鉴定专家魏隐儒先生的遗稿，是一部提要式的古籍善本书目。它收录了魏老自从事古旧书业以来经眼的数千种珍稀古籍，凝聚着魏老半生的心血。在编排体例上，魏老基本上采用了中国古籍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由于集部文献数量庞大，为保证全书各章整体上的均衡，不至出现“鼠首虎尾”的现象，故将戏曲、小说两类析出，各自成编，因此全书分为经、史、子、集、戏曲、小说六章。经、史、子三章之下又分二级类目。

《书林掇英》在款目的著录上非常详细，举凡书名、卷数、著者、版本、行格、版式、序跋、内封、牌记、题记、藏印、内容、源流、刻工、来源、收藏者、购藏者、纸张、册数、定价等等无一不著录，很多书还配有书影，为古籍整理者、研究者和收藏者提供了丰富而极具学术价值的参考资料。后附按语，内容为著者小传。魏老十分重视客观反映书之原貌，很多著录项目都是客观照录原书，为读者提供了更原始、更准确、更完整、更丰富的信息。例如著者项，很多都是照录卷端原题，著者的朝代、职官、爵里、姓名、字号、著作方式等均一一列出。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当年曾看过《书林掇英》书稿，并给予高度评价。言其著录之详细，在版本著录上所下的功夫，“在在都有突过前人之处”。“所著诸书，都为作者目见，绝无转相援引、不尽不实之病。”该书大致反映了建国前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近半个世纪内，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古籍聚散流转情况。“上可与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相衔接，旁参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百年来我国善本书的流转聚散，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了。”

《书林掇英》乃魏老遗著，生前虽已完稿，但未及整理和校对即溘然仙逝，因此内容散乱无序，笔误甚多。整体结构上只是框架初定，经、史、子三章虽设有二级类目，但实际上是各书并未各归其类，混杂一处，甚至还有一级部类（即本书中的“章”）之间归类混乱的问题。集、戏曲、小说三章虽无二级类目之设，但亦存在一级部类之间归类混乱的问题。这就需要将全书所著录的数千种文献重新厘定，各安其类。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总之，书稿距离出版的要求还相去甚远，需要花大力气进行整理。笔者对《书林掇英》的整理校订工作，除了文字上的校对外，主要还做了以下工作：

一、在结构上：

1. 重新归类：

分类混乱是原书稿最大的问题，各章普遍存在，尤以经、史、子三章最为严重。笔者对书